

# 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009 - 2011

( 2009 — 2011 年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编

# 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009 - 2011

( 2009 — 2011年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2009~2011年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9

ISBN 978 - 7 - 5161 - 7855 - 3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196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志兵 刘芳

责任校对 王影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411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b>第一章 晚清政治史</b> .....	(1)
2009 年度 .....	(1)
(一) 晚清制度史研究 .....	(1)
(二) 清朝统治政策研究 .....	(7)
(三) 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	(9)
2010 年度 .....	(13)
(一) 晚清事件与人物研究 .....	(13)
(二) 晚清制度史研究 .....	(19)
2011 年度 .....	(24)
(一) 辛亥革命史研究 .....	(24)
(二) 满汉关系史研究 .....	(27)
(三) 中外政治关系研究 .....	(29)
(四) 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	(31)
(五) 晚清制度史研究 .....	(35)
<b>第二章 近代经济史</b> .....	(38)
2009 年度 .....	(38)
(一) 财政金融研究 .....	(38)
(二) “三农”问题研究 .....	(41)
(三) 资产阶级问题再研究与企业史研究 .....	(42)
(四) 商人团体史研究 .....	(45)
(五) 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	(46)
2010 年度 .....	(49)

(一) 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研究 .....	(50)
(二)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研究 .....	(51)
(三) 关税与财政研究 .....	(53)
(四) 商会、市场结构与贸易网络研究 .....	(55)
(五) 金融监管与货币研究 .....	(57)
(六) 农村地权与农业经济研究 .....	(59)
(七) 经济思想史研究 .....	(63)
2011 年度 .....	(65)
(一) 财政金融史研究 .....	(65)
(二) “三农”问题研究 .....	(72)
(三) 全球史观 .....	(76)
(四) GDP 研究 .....	(78)
(五) 区域经济研究 .....	(81)
(六) 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 .....	(83)
(七) 经济史理论研究 .....	(87)
 第三章 近代社会文化史 .....	(90)
2009 年度 .....	(90)
(一) 社会与文化史理论探索 .....	(90)
(二) 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研究 .....	(90)
(三) 教育与宗教信仰研究 .....	(96)
(四) 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研究 .....	(100)
(五) 总结 .....	(103)
2010 年度 .....	(104)
(一) 社会与文化史理论探索 .....	(104)
(二) 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研究 .....	(105)
(三) 教育与宗教信仰研究 .....	(111)
(四) 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研究 .....	(116)
(五) 总结 .....	(121)
2011 年度 .....	(121)
(一) 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探索 .....	(121)
(二) 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研究 .....	(123)

---

(三)社会生活、女性与法律研究 .....	(130)
(四)教育与宗教信仰研究 .....	(135)
(五)文化传播与文化观念研究 .....	(140)
(六)总结 .....	(146)
<b>第四章 近代思想史 .....</b>	<b>(147)</b>
2009 年度 .....	(147)
2010 年度 .....	(159)
2011 年度 .....	(171)
<b>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b>	<b>(184)</b>
2009—2011 年度 .....	(184)
(一)关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及相关问题 .....	(184)
(二)中国近代史宏观理论体系的探讨 .....	(191)
(三)研究的理论方法 .....	(199)
(四)分支学科的相关理论问题 .....	(205)
<b>第六章 革命史 .....</b>	<b>(214)</b>
2009 年度 .....	(214)
2010 年度 .....	(221)
2011 年度 .....	(233)
<b>第七章 民国政治史 .....</b>	<b>(244)</b>
2009—2011 年度 .....	(244)
(一)历时性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	(245)
(二)横向研究领域的拓展与会通 .....	(256)
(三)几点观察与思考 .....	(263)
<b>第八章 近代中外关系史 .....</b>	<b>(266)</b>
2009 年度 .....	(266)
(一)外交理论与体系研究 .....	(266)
(二)晚清外交研究 .....	(267)

(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对外关系	.....	(269)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外关系	.....	(270)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对外关系	.....	(272)
2010 年度	.....	(274)
(一)外交体制及理论研究	.....	(274)
(二)晚清外交史	.....	(276)
(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对外关系史	.....	(281)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外关系史	.....	(282)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	.....	(284)
2011 年度	.....	(284)
(一)外交体制及理论研究	.....	(284)
(二)晚清外交史研究	.....	(286)
(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对外关系	.....	(288)
(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对外关系	.....	(290)
(五)解放战争时期对外关系	.....	(293)
<b>第九章 台湾史</b>	.....	(295)
2009 年度	.....	(295)
(一)总类	.....	(296)
(二)明郑与清代台湾史	.....	(297)
(三)日据时期台湾史	.....	(300)
(四)台湾光复与光复初期历史	.....	(305)
(五)现代台湾史(1949 年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历史)	.....	(307)
2010 年度	.....	(309)
(一)2010 年度台湾史研究回顾	.....	(310)
(二)2010 年台湾地区台湾史研究简介	.....	(322)
(三)结论	.....	(323)
2011 年度	.....	(323)
(一)清代台湾史研究	.....	(324)
(二)日据时期台湾史	.....	(327)
(三)关于光复的研究和光复初期历史	.....	(330)
(四)国民党退台后的台湾史	.....	(333)

---

(五)跨时段的成果及“台湾学”研究 .....	(336)
<b>第十章 中日关系史 .....</b>	<b>(338)</b>
2009 年度 .....	(338)
(一)中国方面的研究 .....	(338)
(二)日本方面的研究 .....	(347)
2010 年度 .....	(350)
(一)中国方面的研究 .....	(350)
(二)日本方面的研究 .....	(363)
2011 年度 .....	(368)
(一)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再探讨 .....	(368)
(二)日本侵华战争研究 .....	(370)
(三)中华民族抗战研究 .....	(372)
(四)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	(377)

# 第一章

## 晚清政治史

2009 年度

“晚清政治史”学科既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与中国近代政治史学科有所区别，有其独立性。大致说来，中国近代政治史主要从革命史角度，探讨和揭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程；研究时段起于 1840 年鸦片战争，迄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晚清政治史学科的研究时段虽然也起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但迄于 1912 年的清帝退位；既研究晚清 70 年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历史，同时也研究清朝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自身统治而采取的各种对策和活动，以及这一时期的官民、官绅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派系和权力斗争，新兴政治力量的兴起，政制、法律、军事、边政等，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庞杂。

检视 2009 年度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是有关晚清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得到加强，受到学界关注，发表了不少较有学术分量的论文，极大推进了晚清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另一特点是，摆脱了以往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加强了对清朝统治集团方面的研究。并且，无论是涉及清朝统治阶级还是涉及革命事件和人物，学界的研究也都趋于持一个更为客观的立场。下面就本年度晚清政治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和内容，做一具体介绍和展现。

### （一）晚清制度史研究

在晚清制度史研究领域，清末官制改革一直是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山大学的关晓红教授长期致力于此一领域的研究，本年度发表 2 篇相关论文。其中，《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一文对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指出随着清末官制改革、行政范围

的大幅度扩张，行政经费猛增与财政困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造成新政与仿行宪政事务捉襟见肘，清廷因此要求各省督抚议复行政经费，旨在通过清理财政和试行预决算分摊财政负担，加速预备立宪进程；但由于当政者未能审时度势，对督抚们若干重要建议和警示未予以重视，对舆论的提醒亦未采纳，一味通过简单削减预算的办法试图平衡赤字，导致财政与行政相互制约，督抚与清廷离心离德，矛盾日益激化，救亡变为速亡，教训深刻。<sup>①</sup>《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一文对清末议修贡院和废除科举制之间的关系做了具体考察和分析，指出1904年科举减额缓停至1905年立停之间，科举改革的走向、方式及时间，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议修京师贡院为其中重要关节。在京多数部院官员主修贡院，表明缓停定议可能节外生枝，废科举的取向变数极大。张百熙、端方、袁世凯等人采取断然之策，改缓停为立停；张之洞于此虽一度犹豫，但最终附和。疆臣与枢机相互沟通联络，促成军机处和政务处的人事调整，并说服当政绕开部院会议，直接宣布立停科举。制度变革进程充满玄机，从或然到必然，相关人物的主观努力相当重要。然而，精心谋略与强行干预虽可排除障碍，促成科举终结，却难以消除隐患，化解矛盾，避免急行效应带来的社会震荡。<sup>②</sup>

武汉大学的陈锋和暨南大学的刘增合分别对光绪中叶以来引介近代西方预算制度及清季的财政改革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和论述。陈锋认为学术界对中国财政预算的起源虽有不同的认识，但严格意义上的财政预算则始自晚清；就目前史料所见，黄遵宪是最早介绍日本和西方预算之人，也是最早呼吁变法行预算之人；甲午战争前后已经形成实行预算的舆论氛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至宣统年间最终促成财政预算的实施。<sup>③</sup>刘增合则进一步探讨了西方预算制度在晚清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及困境，指出预算制度的嫁接在晚清并不顺利，新制移植过程中，旧式协饷制度、奏销制度、财政积习无一不成为迎拒新式预算制度的排异性因素，旧制衍生的国省财政矛盾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空前激化；清廷本借财政改制以挽救命运，却因新旧对峙、人事派分等制约因素，难破僵局，最终形成新制与旧规并存的尴尬局面，解困的愿望更成泡影。<sup>④</sup>此外，倪玉平对清代咸丰初

① 参见关晓红《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

② 参见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参见陈锋《晚清财政预算的酝酿与实施》，《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

④ 参见刘增合《西方预算制度与清季财政改制》，《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做了考察和分析，指出浙江与江苏同为清代最重要的漕粮输出地，两者合计居全国份额的四分之三。咸丰初年，浙江继江苏之后，全力推行漕粮海运。因自身地理环境的限制，浙江在漕粮出海口的选择上，始终有赖于江苏提供的帮助。虽然此时的政治态势明显属于中央集权体制，两省理应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做到同舟共济，但从咸丰初年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无论是在上海出发，还是选择浏河口放洋，浙江与江苏因漕粮活动中的经费分配、职责分工等方面的原因，矛盾和指责始终不断，势同水火。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是中央集权体制，还是督抚权重格局，区域集团利益总是始终存在，并不会随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变化，所谓的全国上下一盘棋说法，似有进一步思考的余地；而所谓的督抚专权，亦无非是区域集团利益在某些方面的放大而已。<sup>①</sup>

捐纳和保举是晚清一项饱受争议的选官任用制度。杨国强《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一文对捐纳和保举在咸同两朝盛行的背景、状况及对吏治的影响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和分析，指出清代以永不加赋为祖宗家法，而当国家的收支不能平衡之日，便不能不开捐例，用卖官的办法敛聚费用。咸同两朝长期内战一面需要长期的饷需，一面又在大片土地上使国赋因兵燹而化为乌有。而后捐例大开和捐例减成遂以筹饷为旨义一路推广，一路泛滥，又在筹饷的名义下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捐纳入仕的做官人。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还有因打仗而得军功和因军功而得保举，军功和保举产出的也是一批又一批不由科目而径入仕途的做官人。以清代的官制为范围，当时的官场应当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因此，太多的人沿捐纳、保举涌入其间，不能不使官场成为人口过剩的地方。这种现象起于内战之中，又在内战结束后长久地延续于南北之间，随后，满坑满谷的候补官便成了与 19 世纪后期的中国历史相伴随的群类。他们以自己的存在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官界秩序。<sup>②</sup> 刘伟的《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一文对清末新政期间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做了考察，指出晚清以来，随着捐纳、保举的扩大，致使州县候补人员流品混杂、仕途壅滞；而督抚任用中的不拘文法，也直接冲击原有的铨选成例。新政开始后，随着一系列制度改革

<sup>①</sup> 参见倪玉平《清代咸丰初年江浙漕粮海运中的省际矛盾》，《学术月刊》第 41 卷 1 月号（2009 年 1 月）。

<sup>②</sup> 参见杨国强《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的推行，州县官选任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主要表现为：通过学习考试以定去留；变通回避之制，准许县官近省取用；停止部选。但这些变革不仅呈现出被动应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各方利益的牵制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sup>①</sup>此外，赵晓华在对晚清赈捐制度所做的考察中也涉及对捐纳制度的评价。赵认为，赈捐制度在晚清救灾体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晚清赈捐制度有以下三个特点：（1）赈捐举办异常频繁；（2）实官捐输与跨省捐输；（3）倚捐办赈与倚捐办政。晚清赈捐制度虽然在救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但由于晚清捐纳是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选择的一种饮鸩止渴式的自救方式，从赈捐的层面来看，捐纳频施对传统荒政及晚清政局均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赈捐频繁不但加速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下移，加大了地方政府的救灾政治压力，并且也使吏治愈加腐败。<sup>②</sup>

与杨、刘、赵等对捐纳多持负面看法不同，欧阳跃峰和关成刚却给予捐纳更多的正面评价，认为晚清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之初，被斥为秕政的捐纳却为筹办海防和建设海军筹措了大量的经费，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以海防为重心的国防；捐纳人员在儒学造诣、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等方面不及科甲人员，却更具有经济头脑，更容易接受西方的近代理念和价值观，因而在适应社会转型、经营近代化事业等方面比科甲人员具有明显的优势；捐纳人员中不乏确有一些各具专长的优秀人才；在大多数科甲出身的官员不屑于洋务的情况下，洋务派官僚选用优秀的捐员举办洋务新政，参与近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他们的结论是“邪恶之花未必只结罪恶之果”<sup>③</sup>。如何看待捐纳的客观作用，这的确是一个有待重新探讨的问题。

法制史是晚清制度史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也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李欣荣对清末修律中的废刑讯改革做了重新考察和评价，认为刑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运作中本有其特殊的功能，海通以来，西人却以之为中律野蛮的重要表征；甲午、庚子以后，西潮的影响愈趋扩大，朝廷和读书人开始自认野蛮，倡导包括废刑讯在内的根本性的法律改革；修律大臣和朝廷高层并非从维持社会治安的角度，而是从收回治外法权的视角去思

<sup>①</sup> 参见刘伟《清末州县官选任制度的变革》，《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sup>②</sup> 参见赵晓华《晚清的赈捐制度》，《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sup>③</sup> 欧阳跃峰、关成刚：《邪恶之花未必只结罪恶之果——晚清社会转型之际捐纳的客观作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1期（2009年1月）。

考问题，骤然废止刑讯，只保留死罪可刑讯，将刑部、御史和督抚认为废刑讯将不利于审讯的谏言置之不理，结果废刑讯的谕旨实际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原来寄予厚望的西式审判厅之效果也不理想，反而导致讼狱积压、滥用非刑的恶果，于斯可见清季修律急于收回治外法权而不顾实际国情的特性。<sup>①</sup> 艾晶就清末民初对女性犯罪的宽宥做了专门考察，认为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数量和类型都有所增多，但统治者在加强控制的同时，也对犯罪女性进行了一定的宽宥处理。大清律例有专门的条文对女性进行宽大处罚，清末修律更是减轻了对女性犯罪的惩罚力度，民初也在其司法实践中对女性进行相应的照顾。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大赦制度，更是予女性一定的减免罪行机会；有时司法部门的执行者们也会出于矜恤的需要而帮助犯罪女性开脱或减轻罪名。<sup>②</sup> 黄鸿山就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的出现与演变做了颇有学术价值的考察和分析，指出受西方教养院制度和社会形势变化的影响，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等以收容、改造不肖子弟为职能的新型慈善组织首先在苏州出现，继而影响江浙和全国各地。但在传播过程中，其收容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收容改造措施日趋严厉，逐渐演变成类似现代监狱和劳教工厂的机构。洗心局、迁善局不但对后来的刑狱制度改革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慈善事业偏重于生活救助，拯救的只是肉体；洗心局、迁善局则注重思想改造，表现出拯救灵魂的努力。<sup>③</sup> 孔潮丽对清代独子兼祧制度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指出独子兼祧是以一子兼承同父兄弟两房宗祀的特殊继承方式。独子兼祧作为固定的国家制度始于清代乾隆朝，发展于嘉庆、道光时期。独子兼祧制度的形成是历史、习俗和现实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独子兼祧制度巩固了亲兄弟之子的优先继承权；保证兄弟两房一房有子，两房宗祀共同延续。清代独子兼祧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封建继承体制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准。<sup>④</sup> 此外，谢蔚对晚清刑部皂役收入变化及影响做了专门研究，指出皂役收入的多寡和构成直接影响清代基层行政的运作。嘉道年间的刑部国家额设皂役

<sup>①</sup> 参见李欣荣《清末修律中的废刑讯》，《学术研究》2009年第5期。

<sup>②</sup> 参见艾晶《包容与赦宥：清末民初对女性犯罪的宽宥研究（1901—1919）》，《史林》2009年第1期。

<sup>③</sup> 参见黄鸿山《拯救灵魂的努力：晚清洗心局、迁善局的出现与演变》，《史林》2009年第4期。

<sup>④</sup> 参见孔潮丽《清代独子兼祧制度述论》，《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俸禄，据乾隆以来的定例足额支取。至咸丰年间，清政府财政支绌，他们的俸禄没能据定例如数发放。1881年后，刑部国家额设皂役的俸禄仅维持在定例的四成。无论足额还是折扣支取，晚清刑部皂役俸禄都非常低，单纯依靠俸禄难以维持生计，必须依赖刑部补贴，并通过滥用权力获得收入。晚清中央各部皂役收入，刑部是较高的，可见晚清皂役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普遍化，既有人事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弊端。<sup>①</sup>

在晚清外交体制研究方面，权赫秀对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做了考察和分析，指出晚清时期在对外关系领域，不仅在事实上确曾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两种不同体制外交关系共存的客观现象，而且在制度层面负责处理对西方国家近代条约关系之新型机构与主管对周边朝贡国家关系事务的传统对外关系机构，也曾至少共存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朝贡关系体制的边缘亦即周边朝贡国家如近代朝鲜，也曾出现极为类似的所谓“两截体制”的局面与制度。“一个外交两种体制”在晚清时期不仅是在朝贡关系体制的中心与边缘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和事实，而且也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对外关系制度层面非制度性地因应上述客观变化的结果，本质上则可以说是晚清对外关系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现象与特征。<sup>②</sup> 李育民则对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及努力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指出其过程大体如下：由于领事裁判权有着种种弊害，中外双方均感不便，产生了改进这一条约特权的意向。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和英国均谋划补救之法。英国提出“混合法庭”方案，为清政府所接受，但这一计划归于流产。“滇案”对领事裁判权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观审”制度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混合法庭”的变通；赫德提出新的方案，亦为清政府和不少官员所关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激起了清政府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强烈要求。清政府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采取了改革司法法律制度的实质性行动，但陷入了不易解套的困境。清政府的谋划和努力收效甚微，与日本比较，它存在着种种失误和弱点，它所背负的沉重的传统包袱，限制了它的思路和作为。<sup>③</sup>

<sup>①</sup> 参见谢蔚《晚清刑部皂役收入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4期。

<sup>②</sup> 参见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sup>③</sup> 参见李育民《晚清改进、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谋划及努力》，《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 （二）清朝统治政策研究

随着晚清史研究摆脱了既往的革命史研究范式，国内学界还明显加强了对清政府统治政策的研究。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大重要贡献，是为今日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正因为如此，清代的边疆政策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在晚清边政方面，如何在列强日益渗透的情况下行使对西藏的有效统治，无疑是清政府面临重大挑战之一。孙宏年对清末达赖、班禅关系演变及清朝治藏政策做了考察和分析，指出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互为师徒、相互礼让的和好关系在清朝末期开始发生变化，两大活佛系统的矛盾日益加剧。清朝中央政府和驻藏大臣也介入其中，从对达赖、班禅都有所猜忌到明确支持班禅系统、压制达赖系统，使两大系统的矛盾不断激化，达赖方面与清政府、驻藏官员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些矛盾在清朝崩溃前夕全面爆发，并对以后 40 多年的西藏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sup>①</sup> 许广智和赵君就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做了考察和分析，指出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奉行对外妥协退让政策，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至清末，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以收回政权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化改革，与西藏僧俗封建主积怨渐深，给英帝国主义在西藏上层中培植亲英势力、进行分裂中国的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但驻藏大臣在改革过程中，极力维护中央权威，切实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使往日大权旁落的局面有所改变，对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抵御外侮、守疆卫土、整饬军政、讲求吏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西藏地方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然继承和延续元代以来与中央政府所形成的政治隶属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sup>②</sup> 徐君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对晚清政府在海防、塞防俱紧背景下川藏经营思想的形成以及“固

<sup>①</sup> 参见孙宏年《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1 期。

<sup>②</sup> 参见许广智、赵君《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

川保藏”“筹边援藏”等边防策略的实施状况做了考察和探讨，对丁宝桢的治藏政策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丁宝桢对于西南边防及西藏问题的思考与措施，积极推动了清政府更加重视西南边防问题，为中枢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与同时期的几位驻藏大臣相比，丁宝桢关于西藏以及西南边防的看法要全面和高明许多，每次上书所陈奏内容多是在详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也由此显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丁是清朝晚期第一位把川藏视为一体并进行筹划、进而采取相应措施的边疆大吏。<sup>①</sup>

除清政府的西藏政策之外，一些学者还就清政府在应对晚清国内各种事变中的反应和对策进行探讨和反思。如王敏通过考察“苏报案”交涉，检讨晚清政府在应对政治危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激化了朝野矛盾、中外矛盾以及清政府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苏报案”的发生和交涉反映出晚清政府应对政治危机的无能。<sup>②</sup>李细珠则以长沙抢米风潮为例，重新考察和分析清政府在清末民变中的社会控制机制效能，指出：通常情况下，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绅士的辅佐，绅士充当了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调停人的角色。然而，当绅士本身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甚至受到损害时，绅士阶层就可能与官府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长沙抢米风潮中，由于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绅士不但不能辅助官府，反而利用饥民情绪与官府对抗，致使官府应对乖方，无法控制事态发展。清政府强行抑制绅权，严惩肇事的旧绅士代表，使其逐渐疏离官府，而新绅士也因预备立宪进程缓慢对清政府产生失望情绪。由于官绅矛盾激化，官绅关系产生裂痕，传统社会控制机制运转失灵，从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其迅速走向覆亡之路。<sup>③</sup>

对于清政府在清末新政期间一些统治政策和应对的失误，苏全有发表3篇相关论文，加以检讨。其中，《论清末新军的国家失控》一文探讨了清政府在控制新军方面失败的原因，认为新军失控固然有革命党人策反等客观外在原因，但也有清朝政府自身的失策，具体表现在一是中央政府的

<sup>①</sup> 参见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2期。

<sup>②</sup> 参见王敏《从苏报案看晚清政府对政治危机的应对》，《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sup>③</sup> 参见李细珠《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以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为视点》，《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无能，二是清政府心态过急，三是对清末新军的控制较为宽松，四是相对弱化了旗兵建设。<sup>①</sup>《清末新军失控现象的另类解读——以袁世凯式军队控制为视点》一文，则对袁世凯比较成功控制北洋新军的经验加以考察和总结，认为袁世凯成功掌控北洋新军的手法有三：一是强化军事学堂的控制，重用武备派而非有异化倾向的留学生；二是借助勇营制度，强化对军队自身的控制；三是培植派系统属，愚化下层士兵。清朝中央政府之所以对北洋新军失去控制，勇营制度的实行是一重要原因；袁世凯得以控制北洋新军，最主要的原因来自制度层面的运作，其个人作为只能视为对制度作用的效验及推进。<sup>②</sup>《从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一文认为，丁未黄冈起义尽管历时仅仅数日，但清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也暴露出种种不足，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预警机制的缺失；（2）社会控制能力弱化；（3）对舆论宣传控制不力；（4）人事协调能力弱化。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sup>③</sup>

### （三）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

政治史总离不开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往学界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但以往研究多偏重战争过程及中国与各列强的交涉，甚少注意当时舆论对战争的影响。在这方面，吴义雄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一文具有补白意义。该文就鸦片战争前夕在华西人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做了具体考察，指出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

<sup>①</sup> 参见苏全有《论清末新军的国家失控》，《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

<sup>②</sup> 参见苏全有《清末新军失控现象的另类解读——以袁世凯式军队控制为视点》，《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2卷第4期（2009年7月）。

<sup>③</sup> 参见苏全有《从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中州学刊》2009年第3期。